

论孔子的“小人”观

——兼谈马克思的劳动群众观

张茂泽

(西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孔子所谓“小人”,指社会地位低下的劳动群众,尤其指心胸狭小、道德有缺的人。他将君子和小人对言,要求人们学而时习,克己复礼,“脱小”做君子,成圣贤。现在学界研究君子文化很热闹。须知,小人不“脱小”,君子、圣贤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产生,难生存,难新生。君子难做,不只在君子,也在小人。儒学强调人性修养和文明教化,提倡做圣贤君子,针对的应主要是绵延不绝、数量众多的小人,必须帮助其修养,教化其成人。小人“脱小”是人们成为君子的必由之路。马克思为此提供了科学的唯物史观作指导,儒学则为此准备了人性修养和文明教化的众多具体办法。

[关键词]孔子;小人;君子;脱小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4.09.010

孔子以来,“君子”一名,光鲜亮丽,人人争言。如今君子学会遍地开花,繁花似锦。小人却看起来惨不忍睹,说起来羞于启齿。但要意识到,在小人的汪洋大海里,君子多难产;偶有君子,岂能独善其身?历史上,君子小人之争,小人成群结党,人多势众,君子孤傲高洁,总是独木难支。小人不“脱小”,君子、圣贤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产生,难生存,难新生。君子难做,不只在君子,也在小人。儒学强调人性修养和文明教化,提倡做圣贤君子,但圣贤君子在历史上的众多人口中寥若晨星。儒学思想针对的应主要是绵延不绝、数量众多的小人,要帮助其修养,教化其成人。儒者修养、教化数千年,但人口不断增长,小人依然层出不穷,有时甚至人多势众。小人“脱小”问题可谓儒学数千年最难啃的“硬骨头”。对小人展开专门研究,十分必要。

古人所谓小人,在阶级地位上指农工商等生产劳动者。他们从事社会生产活动,本应是国家、社会的主人翁;但他们在政治经济、道德文明上都处于弱势地位,需要全社会关爱、帮助。儒家关注小人,致力于研究小人,建立人学,提出了一套小人升华,成为君子、圣贤的儒学思想体系。儒学作为人学,研究人的问题,研究现实的人成为理想人的问题,小人是儒学关注的重要对象。孔子作为儒家创始人,其“小人”观念尤其值得关注。

作者简介:张茂泽,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思想史研究。

今本《论语》明言“君子”97次,“小人”22次。君子固然为孔子所提倡,但作为人们修养成为君子的现实起点,小人也不可忽视。《论语》言“小”,除了“小人”“器小”,还言“小子”。如孔子在陈,说:“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公冶长》)吾党之小子,朱熹认为“指门人之在鲁者”。这和道德上的“小人”称谓无关,不予讨论。

思想是社会历史的反映,小人观也反映人们对社会弱势群体的认识和态度。今天我们认识历史上的小人观,应注意两点:一是儒家如何认识、对待小人;二是历史上的小人,其实际社会生产生活如何。儒学小人观反映了儒家对小人的道德批判和期待,有时也包含重视民生的儒者对小人生活贫困、愚昧等状况的关注和改进建议。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令人民群众满意向往的理想社会,也不能不关爱弱势群体,研究和解决劳动群众“脱小”而为君子、圣贤的问题。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重要的是要提高劳动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经济建设,要致富,先脱贫,民众脱贫是第一步。道德建设,做君子,先“脱小”,劳动者“脱小”是基础、主体。

马克思治学,站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群众立场,为劳动群众计薪酬,谋出路;以此为基点,他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用以指导劳动群众认识和改造世界,创造文明,推动历史前进。马克思并不将劳动群众视为小人,反而认为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国家的主人翁。但现实地看,也需要指明,必须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修养,劳动群众创造历史、当家作主才有现实条件。否则,小人掌权,德不配位,不免肆无忌惮,胡作非为,混淆是非,播恶于众,其害不可胜言。国家不治,社会不安,家庭不睦,朋友不信,人们如何创造历史,历史怎能发展进步!在新时代,劳动者“脱小”已成关键问题。

一、“小人”的社会和人格特征

在汉语言文化界,君子和小人对称。君子有贵族、道德高尚等意义,小人也就有社会劳动群众、道德缺乏等意义。小人的伦理意义和社会意义不同。儒家所谓“小人”,主要指道德人格的小,而劳动群众所谓“小人”,则指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低下。虽然都称小人,但意义并不相同。不过,因为“小人”外延多指向农工商等劳动者,所以,对小人的伦理和社会两种意义,可以结合起来,集结在“小人”旗下尽心研究。

历史上,如果君子指治国者、贵族、文明人等,那么,小人则指劳动群众,如平民、农工商从业者、文化程度低下的“野人”。^[1]这体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政治地位区别。侯外庐说,儒家“把君子与小人概念化而为周比之别、义利之别、上达下达之别、坦荡荡常戚戚之别、成美成恶之别、和同之别、大受小知之别、易乎难说之别、风草之别、存之去之之别、劳心劳力之别、安荣安辱之别、勤礼役力之别,在客观上是证明了现实的社会”^[2]的阶级分化和斗争。《论语》载,樊迟请学稼、圃,孔子答以“吾不如”老稼、老圃,然后斥樊迟“小人哉”。(《子路》)朱熹注:“小人,谓细民,孟子所谓‘小人之事’者也。”^[3]孔子言小人、女子难养,朱熹注小人指“仆隶下人也”。^[4]这都是指与“上”相对的、参加农工商生产的“四方之民”。(《子路》)历史实情是,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时,生产条件恶劣,加上剥削制度的存在,阶级分化,生产劳动被视为“鄙事”,劳动者生活水平低下,“陷入每况愈下的非人境遇”,^[5]总是要“谋食”“忧贫”,而缺乏物质条件以“谋道”“忧道”。(《卫灵公》)

如果君子指有道德有理想的文明人,道德高尚,那么小人就指违道悖德、自私自利的人,道德低下,或道德欠缺。在此意义上,君子成为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赋予了丰富的道德内涵;^[6]同时小人也受到特别关注。孔子关注小人,提出了“喻于利”“怀土怀惠”“同而不和”“比而不周”“长戚戚”等社

会心理特征。

概言之,儒家仁爱的小人,主要指贫困、愚昧的劳动者,他们是社会政治地位、文明水平低下的弱势群体。其所谓小,是幼小、弱小;儒家批评的小人,主要指道德人格的小,是心胸心眼小、气象格局小。两种小不同,但互相交织、影响。从社会历史发展角度看,社会的小是关键,是根本,应有计划地大规模扫盲、脱小。从个人发展角度看,道德的小是重心,应加强学习修养,自己率先脱小,不要坐等社会、政府。

在《论语》中,孔子论及小人,揭明其道德“小”的三大特征:

第一,不仁不义是小人的伦理特征。

在孔子看来,“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仁是君子的本质特征,君子可谓仁者;小人反是,乃“不仁者”。孔子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君子或许会不仁,但也不存在小人仁的情况。“不仁”应是小人的“标配”。作为“不仁者”,小人有哪些特征呢?孔子发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里仁》)朱熹解释:“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约必滥,久乐必淫”,^[7]终会为功利得失、个人私意等“外物”所夺,为物所役。在儒家看来,“人而不仁则非人”,^[8]不仁就叫“违仁”,即现实中有人背离仁德,人性异化,人不成其为人。“违仁”与否,关键在是否有仁德,去私欲。朱子明言:“仁者,心之德。心不违仁者,无私欲而有其德也”。程子也说:“不违仁,只是无纤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9]为什么有私欲就不仁?二程解释:“非礼处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须是克尽己私,皆归于礼,方始是仁。”在二程看来,“非礼”言行的实质也是内心有私欲,外则必非礼;外非礼而内私欲,其仁爱本心被遮蔽,人就异化为“不仁”了。故朱熹断定:“非礼者,己之私也。”^[10]“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11]不仁源于自私,自私自利是小人的伦理特质,可谓程朱理学的共识。

在孔子那里,义也是君子的本质特征,则小人便是不义。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朱熹注解:“怀,思念也。怀德,谓存其固有之善。怀土,谓溺其所处之安。怀刑,谓畏法。怀惠,谓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尹氏曰:‘乐善恶不善,所以为君子。苟安务得,所以为小人。’”^[12]小人自私,畏法贪利,苟安务得。能否如愿,小人无力掌控,莫可奈何。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朱熹解:“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义,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13]君子小人依然是义利之别。

当今市场社会利益观念盛行,体现在君子、小人之辨上,网上有“北大师生”认为,君子小人区别不在于是否追求利益,而在于“是否看到利益背后的道义”。^[14]意思是说,君子小人都追求利益,只是君子意识到:我追求利益,但我知道,我的利益追求背后有道义。简单说是我求利,我道义。小人也追求利益,但他们不知其是否道义;简言之是我求利,我糊涂。这就将君子小人之别的道义标识改为利益追求中有无道义意识,而非义利之辨。古人义以为上,不谋其利;今则利以为上,道义随之。这反映了现实社会不少人道德要求降低,利字当先,义要让路。在道德实践中,这一观念可能导致不良现象:有些人追求个人私利,而自以为符合道义,其实未必真合道义。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多自我标榜自由民主道义;而劳动群众追求利益,他们没有注意是否道义,但未必就不符合道义。

第二,主体性低幼,平时拉帮结派,遇事惯于求人,是小人的社会交往特征。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朱熹引杨氏注:“小人求诸人,故违道干誉,无所不至。”^[15]遭遇问题,寻找原因,君子多反思自己,依靠自己学习,提高修养,以解决问题。小人却习惯于

推诿责任,怪罪环境,指责他人,放弃自己努力解决问题的责任和成长机会。故君子有较高主体性,小人则主体性低幼。与人交往,总是带有功利目的,希望获得帮助,而不管黑白是非,是以比而不周、同而不和。对阻碍自己功利的人,则诋毁污蔑,甚至杀人放火。

从社会交往看,孔子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朱熹注:“周,普遍也。比,偏党也。皆与人亲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为不同,如阴阳昼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则在公私之际,毫厘之差耳。故圣人于周比、和同、骄泰之属,常对举而互言之,欲学者察乎两间,而审其取舍之几也。”^[16]君子不拉帮结派,因为他们公正无私;小人自私、偏党,所以无所不为。

从人的发展角度看,孔子概括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宪问》)朱熹注:“君子循天理,故日进乎高明;小人殉人欲,故日究乎污下。”^[17]关于“小人下达”,“达”义何解?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孔子答曰:“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颜渊》)自己实有其德,“德孚于人而行无不得”,令人信服,是为达,为君子。若小人,则“善其颜色以取于仁,而行实背之,又自以为是而无所忌憚”,^[18]人前假仁假义,人后不仁不义。下达,在道德修养上只是不达,非达,无达,人格卑污;在认识上只是未达,见识粗疏,理解浅薄。“下达”,言其道德缺乏或低下,却安于现状,不求进步。

第三,追悔忧惧是小人的社会心理特征。

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朱注引程子语:“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于物,故多忧戚。”^[19]“君子不忧不惧”,(《颜渊》)小人既忧又惧。因为君子“内省不疚”,无愧于心,本无忧惧;小人忧惧,因为他们一旦反省,必疑惑忧惧,追悔愧怍。是以君子常舒泰安乐,小人多忧戚愁苦。从根本上看,则因为小人多私欲而役于物,只是一直做工具,被动、被迫而无前途;君子循天理而役物,能做主人,有自由。小人自私自利而多被驱使,故多忧愁痛苦。朱熹谓之“器量浅狭”,^[20]心胸狭窄。他们心眼小,见识少,一生谋食忧贫,无暇虑及家、国、天下;格局小,见识浅,一生忙于应付生存压力,未及理性思考解决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提升人格境界;欲求小,志向少,自己现有那点资源、能力,支撑不起分外野心,贫穷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君子思不出其位”,(《宪问》)素其位而行,按照自己社会政治经济地位而言行,依照自己人格地位而修养,是以脚踏实地,心明眼亮,能担责任,任重道远。小人有点想法,即冥行盲动,转眼成空,遂困局缠身。

孔子论小人,往往和君子对比;他揭示小人特征,也以仁义道德君子为标准加以衡量判断。这是正确的,也富有深意。因为善是善的标准,也是恶的标准。恶自身无标准,它只是善的缺乏。没有伟大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小人之小,正在于心眼小,格局小,欲求小,总之是心胸狭窄,道德缺失。小人缺乏仁义道德修养,自己不仁(不爱人而爱财好货,贪生怕死,畏惧鬼神)、不义(缺乏正义感,对社会不公、他人困苦麻木不仁,不讲义气,欺软怕硬,随顺作恶,甚者为虎作伥)、不礼[为人不诚恳,“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没规矩、无底线,对人虚情假意,祭祀不虔诚]、不智[孔子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子路》)小人反是,总是不知而自以为知,好像无所不知,自负,与人交往,而又“言不及义,好行小慧”,(《卫灵公》)只是“私智”^[21]经验的眩惑]、不信[言语反复,自相矛盾,言行不一,不讲信义]、不逊[孔子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季氏》)小人不畏天,不敬大人,不尊圣人,是以肆无忌憚;又言:“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小人逞欲恣肆,虚骄自满]等。

对待他人,小人冷漠无情,漠不关心。他人落难,则幸灾乐祸,甚或落井下石;他人荣光,则嫉恨贬斥,甚至造谣中伤。便如孔子所言,“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而小人用人,

总是用功利眼光审验,求全而责备。人们对待小人,“难事而易说”,(《子路》)说之以利必中;小人患得患失,是以任用小人,给足够实惠,用功利劝赏,“惠则足以使人”。(《阳货》)

二、“小人”的认定问题

网上常见指人不道德者。他们自己俨然君子,兀然屹立于道德高地,俯视评点芸芸众生,令人生厌。将“小人”贬称作为一顶臭帽子,到处赠人辱人,足见其无仁爱心,而又心胸狭窄,刻薄严苛。其实,“小人”并非现成标签,可以到处乱贴。因为“小人”本身并无固定标准。是否小人,当以君子、圣贤为准。读《论语》《孟子》,能认识“道”,便知圣贤模样、君子要求。道是圣贤的本质,圣贤是道的人格化。道和圣贤,“如尺度权衡相似”;以此量度事物,认识评价他人,“自然见得长短轻重”。达不到圣贤高度,是为君子;达不到君子高度,即是小人。故圣贤标准不立,君子不出;君子标准不立,则小人不出。今动辄指人为小人、不道德,并非以君子为准绳,而是以自己为准擅自揣测、评价。人之寡廉鲜耻、厚颜无耻而假道德者,莫此为甚。

在儒家看来,道德指人性,凡人必有道德,区别只在多少、高低。小人也必有其德,固有其人性修养。比如,历史上有人称对方为大人,而自称小人,可以视为其谦逊表现。他们自以为小人,坦率承认不足,说明其已经意识到要努力修养,成就君子人格。他们自称小人,而实为真君子。反之,自以为君子者,其言行活动却精致利己,多伪君子,乃真小人。这实乃吊诡现象。盖道德修养的关键在本性觉悟,在身体践行,而不在以名词言语表现于人。凡局于名词言语讲新儒学,而未见其道德践行者,乃伪儒学,直与假道德者等,皆应受到批判。

从“小人”伦理意义认定还可引申出三个问题,需要讨论:

首先,提倡做君子,反对做小人的孔子,他自己是不是小人,这其实是一个问题。生前,有人称孔子为圣人,他谦辞,后人更尊其为至圣先师。孔子被后人尊为圣人,时人也称他圣人、君子。孔子明确否认自己生而知之,那他也必否定自己生而君子、生而圣人。那孔子成为君子、圣人,也当自小人起步,学习修养,“脱小”升格而成。他常言学习,学以成圣。他提倡人人做君子,暗含前提是不是大家现实中都是小人?如果天生君子、圣贤,何须再行后天修养!

孔子自言“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又言:“吾不试,故艺。”(《子罕》)他少时身处社会底层,地位卑贱,没有背景后台,“不为世用”,^[22]生存压力磨炼了其坚强意志,练就了若干生产生活技能。这正是天下劳动群众一般生存状态。孔子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小人。因为他是平民,所以他温良恭俭让,“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公冶长》)但他不满足于此,而是好学一生,借此成才。

人们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小人境遇呢?向孔子学习!孔子好学一生,表扬子贡“不受命”,说明他自己对现有环境不自安、不甘心而努力修养,追求改变现状,提升自己,脱离小人之域,成为君子。孔子本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小人,但他不满现实,“不受命”,通过人性修养、文明教化实现小人化龙,升格为君子、圣贤的楷模,“脱小”成才正是其人生奋斗的轨迹。孔子是平凡小人,但他好学不厌,不断进步,高达圣人境界,确实令人感佩振奋,使人跃然兴起。

在当时,像孔子这样的成功人士不止他一人。有史家发现,在先秦时期,社会阶层变动,君子演变为小人,正体现了时代的进步。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将我国先秦学术史划分为学在官府、邹鲁缙绅先生的诗书礼乐之学、孔墨显学、战国诸子学几个阶段。他解释说:“‘缙绅’二字顾名思义是披着君子外衣而走向‘国民’的领域。墨子为了矫正时代,不惜蓬发、短褐、木屐、步行而‘为天下先’,故意扮演出‘贱人之所为’”(《贵义篇》)。其实,时代发展到了战国力政之时,必然有大群贱人,未能拘束

于‘中国的拉丁文’（古文），便取得‘国民’资格，出而做职业观念家。”^[23]随着生产发展，一大批从劳动者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走上历史舞台，奠定了百家争鸣的社会基础。他们有些人出身君子贵族，另一些人则是普通平民，但又都有劳动者的经历经验，有参与社会劳动实践的“小人”般亲切感受。孔子出身贵族，但他少时贫贱，已经和普通人无异。这样的知识分子当不止孔子一人。他们追求做君子以超越现实，改善人生境遇。这可以视为儒学兴起的“小人”社会心理原因。

其次，关于小人有无道德的认定，也是一个问题。小人为道德上的贬义词，有批评否定、藐视不屑之意。其实，在古人看来，道德即人性，人必有道德。完全没有道德的人，并不存在。言小人无德，并不准确。应当是小人有道德，但其道德或许低下，或本有道德而未显现、自有道德而人不知。逐步交往，渐有深交，便知人皆有爱亲敬长、与人为善之心，有乐道人善、成人之美意愿等。如此，则所谓小人，实际上其人格并不一定小，只是表现不充分、他人不知道而已。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他人不知自己本性、内心，而误以为小人，自己并不生气。这本身就是君子风范啊！如此看来，世人以为小人，其实人家本是君子的人当有很多很多。

最后，关于劳动群众有无道德问题。如果小人指劳动群众，那么，说小人无德，是不是就是说劳动群众无德？这当然是错误的，即使古代儒家也不这样看。孔孟等儒家明确承认劳动群众有道德天赋；说明这一点，帮助人们发现、充实和实现其道德天赋，知性成性，以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正是儒学的中心任务。《尚书》已有“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信念。孔子说“天生德于予”“人之生也直”，相信“人能弘道”，明言“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卫灵公》）朱熹注解，孔子的意思是，今日民众，善其善，恶其恶，“而无所私曲”，^[24]和三代民众道德完全相同。孔子并不认为民众道德低下，自私自利，反而肯定和相信民众有道德潜力和能力。曾子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泰伯》）孟子言，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大家心同理同，并无本质区别。他提出人本性至善，认为这是民众“固有”道德，良知良能；以此修养，人皆可以为尧舜。正因为民众有其至善本性、固有道德、无限潜力，所以治国理政，必须民贵君轻，爱民保民。北宋关学领袖张载也说，民众虽至愚无知，但只要“事不碍”，事情不涉及个人利害得失，则“自是公明”，^[25]是非黑白，能分辨得清清楚楚。儒家肯定民众有道德天赋和潜力，这成为儒学能够成立和推广的现实基点。

孔孟相信民众本性良善，不将吃穿住行视为人的本性欲望，但他们也强调治国者实行德治或仁政，必须理性对待民众的现实欲望和意见。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但同时也强调，“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卫灵公》）对民众的情感好恶，充分重视而又理性审视。既承认民众有其善良道德本质和希望，又要理性看待民众道德现实状况，借助教育、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活动，引导和帮助他们加强学习，提高修养，不断向善向上。如果有人径称劳动群众为小人，乃是侮辱；将劳动群众视为先天可能的恶人，以赏罚二柄治国理政，对待民众总是如坏人般防范、利用，乃是法家惯常做法，儒家历来坚决反对。

将劳动群众视为不仁不义、愚昧自私，马克思对此更是坚决反对，认为这是对劳动群众的道德污蔑。比如，19世纪40年代，德国鲍威尔等鼓吹说，只有杰出的人物，即“精神的”、“纯粹的批判”的体现者才是历史创造者，而群众、人民似乎只是毫无生气的东西，是历史发展的障碍。^[26]马克思说：“群众性似乎多少是被批判的事物和人物的特性。”诚然，历代统治者及其帮闲总是“把群众说成有限的、粗野的、鲁莽的、僵死的和无机的”，他们污蔑劳动群众鄙俗、下流、温驯、世俗、卑贱、愚蠢、罪恶、精神空虚、冷酷无情而且冥顽不化。^[27]实际情况是，统治阶级“把自身的愚蠢硬说成群众的愚蠢”“把自己的利己主义硬说成群众对精神的利己主义式的抵抗”。^[28]毛泽东也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

蠢。”高手在民间,劳动群众掌握了丰富的生产生活智慧。历史上的贤明治国者,都不是关起门来自作主张,而总是问政于民、问计于民,到民众中找问题,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答案。治国者脱离群众,自以为是,离开人民,自作主张,将自己摆在和民众对立的位置,是历来国家治理出大问题的根本原因。

三、对待“小人”的正确态度

过去我们用阶级分析方法看人,认为人分成不同阶级,不存在普遍超阶级的“普遍的人类爱”。孔子的仁爱,绝不是爱一切人。他将人分为君子和小人,提倡做君子,“坚决反对小人”。^[29]孔子对待小人究竟是什么态度?他反对小人,不是放弃,更不是要消灭,而是仁爱他们,要求“养”民。他的名言女子、小人“难养”,(《阳货》)难养,如今人言难将就,难对付,这是仁爱中的困难。如果对小人没有仁爱,自然没有“难养”之叹。为什么仁爱小人中有困难?因为现实中,小人生存发展,既重要又难解决;治国者如尧舜,博施济众也有难度。人口众多,而又生产不足,分配还不公,社会怎能安稳?这令孔圣烦恼,“难养”说正是治国者治民、养民遭遇困难的反映。

今天我们研究小人,和他们相处,不是要猎奇,看热闹,或显示自己高大,幸灾乐祸;也不能放弃,漠不关心,令其自生自灭;更不能暴力消灭之。或视小人为国家负担,为城市低端,为家庭累赘,而缺乏仁爱耐心,调动军警控制、封禁、驱离,甚或屠戮消灭之,这便是历史上法家式残暴统治。其反人民性和动摇国本,已经反复证明过了。

对待小人,中华文化有优秀传统。首先,在思想上,承认小人是人,和君子、圣贤一样人性善,有教化成德的无限潜力。在我国古人看来,小人都是候选君子。我们应将小人视为人,推己及人,仁爱他们,尊重他们,帮助他们成为人。其次,小人也自视为人,为万物灵长,有恻隐心、羞耻心、谦让心、是非心。小人多以君子、圣贤为荣,以小人、禽兽为耻。小人多能自觉向上,往君子、圣贤方向前进。你看,他们都自然亲近有仁爱的人——他们乐观人成,而非嫉贤妒能,乐道人善,而非拨弄是非,自然疏远冷漠无情、自私自利的人;他们内心敬重有羞耻心的人——他们以不能自强不息为耻,以不能厚德载物为耻,以违背礼法纪律为耻,都瞧不起寡廉鲜耻的人;他们喜欢谦让虚心的人,讨厌自以为是、厚颜无耻的人;他们本就明白是非,知晓黑白,鄙夷那些不明是非的糊涂蛋。实际上,在数千年中华文明史上,国人生产生活,多能遭遇挫折不气馁,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坚持理想信念不动摇,不达目的不罢休;即使环境条件恶劣,也不放弃,厚德载物,宽容忍让,而又讲原则,有底线。考试失败,不是怪罪监考严格,作弊未成,而是反思自己,学习更加努力,争取下次考试成功。小人不仅是社会生产活动的主体力量,而且是道德上“脱小”升格为君子的不竭源泉。中华文明持续发展,光辉灿烂,也可谓小人“脱小”的人文成绩。

小人受关爱,现实中有两类:一是小人何以自处?

孔子告诫子夏:“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雍也》)“儒”指学者,君子儒,有学问而又为君子;小人儒,有学问但是小人。小人儒、小人,为孔子所批评、嫌弃。程子解释:“君子儒为己,小人儒为人。”程门谢良佐谓:“君子小人之分,义与利之间而已。然所谓利者,岂必殖货财之谓?以私灭公,适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30]小人自私自利,但不要满足于此,而要学习奋进,从小人中超脱出来,成为君子。小人尤其要重视人性修养,自觉提高自己,学习那岁寒时的松柏后凋、蜡梅怒放。

现实生活中,小人缺乏道德,还能生存发展,或许他们有一定社会专长,甚至是某方面的业务能手、专家。孔子说:“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卫灵公》)朱熹注:

“盖君子于细事未必可观，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虽器量浅狭，而未必无一长可取。”^[31]君子忠厚可信，可委以重任。小人巧言令色，难挑重担，却可办小事、杂事、烦心事，有些还有独特专长。小人道德欠缺，又无专业技能，则其生活艰难可知。

小人如原壤，社会影响小。若政府官员是小人，还安于现状，不学习，不上进，必然带坏民众，播恶于众。所以，儒家强调治国者要有大格局，提倡大器，批评“器小”。孔子说：“管仲之器小哉！”（《八佾》）朱熹注：“器小，言其不知圣贤大学之道，故局量褊浅，规模卑狭，不能争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愚谓孔子讥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俭，故斥其奢以明其非俭。或又疑其知礼，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礼。盖虽不复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于此亦可见矣。……苏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于国，则其本深，其及者远，是谓大器。扬雄所谓大器犹规矩准绳，先自治而后治人者也。管仲三归反坫，桓公内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浅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复宗齐。’杨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盖非王佐之才，虽能合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称也。道学不明，而王霸之略混为一途。故闻管仲之器小，则疑其为俭，以不俭告之，则又疑其知礼。盖世方以诡遇为功，而不知为之范，则不悟其小宜矣。’”^[32]管仲器小者，管仲个人德礼修养不够，只管个人享受而不管天下国家，只求满足国家功利而不及王道政治。小人之小，如斯而已矣，治国者也不例外。

孟子解释为什么有大人、小人，他说：“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如何从其大体、养其大者？就是不要“以小害大”“养小以失大”，不要因满足个人耳目口腹欲望，而富贵能淫、贫贱必移，见威武便屈，毫无人的尊严；而应注重个人主体修养，“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告子上》）孟子提倡做大丈夫，特征是：内则居天下广居，立天下正位，行天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外则显浩然之气，刚正不阿，沛然莫之能御。在孟子处，人人本性至善，人皆可为尧舜，君子小人的矛盾被良知觉悟和恻隐之心等抑制、克服，故治国者能视人若己，爱民如子，与民同乐，与民由之；在理想的仁政世界，君民、官民关系亲近，犹如一家人。则小人虽小，但依然受关爱，被照顾，而能温饱生存下去。

二是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小人？小人并不等于恶人。恶人丧尽天良，违法乱纪，而又卑鄙龌龊，势利偏狭。小人只是贫困，没文化，心胸狭小，见识短浅。目不识丁，反瞧不起读书种子；贫困潦倒，偏摆出富贵规模。哪里有利己主义，哪里就有舍己救人，小人堆里自生君子。应该说，小人变坏，才是恶人；小人完全可以变好，成为君子。关键在靠劳动吃饭，与人为善，还坚持学习，虚怀受教。

我们自应同情理解、积极对待小人，视之为候补君子。陪伴他们生活，真正了解他们，或许会发现，他们本性良善，可爱可敬处甚多。在生产生活中，当如父母对子女，有陪伴、等待的耐心，尊重、鼓励他们，多给其展示、发展机会，促其积善成才，有时甚至要关爱、帮助他们，献爱心，施援手，纾困解忧。有三点需要注意：

第一，仁爱之。君子是美好品质的人格化，小人可谓美好品质缺位。美好品质犹如温暖阳光，给人希望和力量。小人需要仁爱、关怀，才能有尊严地生存发展。君子爱小人，爱之而无恻隐之心乎！孟子言：无恻隐之心，非人也。爱之而勿劳乎！无劳动奉献之心，非仁也。爱之而无陪伴之心乎！无陪伴成长之心，非爱也。

第二，“举善而教不能”，（《为政》）文明教化之，帮助其健康成长。在孔子看来，最重要的修养和教化内容，是如何帮助民众学习提高。孔子分析民众社会地位低下的修养原因时说：“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民众社会地位低下，跟他们不学习，又缺乏学习的社会条件有很大关系。孔子的论断很有道理。他创立儒学，用以教人，正是要求民众都学习上进，不断提高人性修养和文明素养，并

为此办私学,因材施教。学习正是民众“脱小”的必经之途。至于治国者希望民众学习,“小人学道则易使”,(《阳货》)自有其统治功利目的。

至于教化方式,孔子要求寓教于乐,循循善诱;老师要诲人不倦,忘我奉献,对学生要有三分教育、七分等待的耐心,有熏陶滋润、玉汝于成的苦心。历史上治国理政,教而不听则刑罚之,这在后来发生了分化。儒者爱民如子,“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总是坚持教化不放弃,而少及刑罚;即使刑罚也着眼于教化来进行。总之要追求“民德归厚”,(《学而》)养成文质彬彬风度、淳朴浑厚民风。这样的德治方式,用于办事情,应对公共危机,解决紧急事故,或许乏力;法家严刑峻法,以法为教,强制灌输,方法简便易行,或更有行政效率。但法家思想实践开来,严刑峻法,以刑去刑,终流于刻薄寡恩;只能使民众“免而无耻”,(《为政》)苟免刑罚,但依然没有羞耻之心。结果,社会上民心涣散,戾气日重。这样治国理政,终究会失民心,国将不国。

第三,慈济之,民众急难愁盼问题,政府要慈善救济,博施济众,不因市场交易原则而束手束脚,裹足不前。

马克思也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33]历史发展,集中体现为劳动群众的发展,绝非劳动群众的消灭。想方设法给劳动群众谋出路,帮助他们生产生活,不断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站在民众立场,与民众心连心,想民之所想,为民之所为,马克思和儒家是志同道合的。

四、“小人”的历史和未来

儒学和马克思的学说都涉及小人问题。儒家小人观指明了小人的理想是君子、圣贤,最重要的方法是心无私、天地宽,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这可以使个人达到天人合一境界,希贤成圣都有可能,但还不能直接解决劳动群众吃穿住行等现实物质生活问题,也不能根除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关系不合理、上层建筑阻碍生产发展等,而导致人性异化等问题。现实地看,君子飘忽不定,圣贤踪迹难觅。几千年来圣人唯孔子一人,加上之前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也不过八人。现实的人见不到圣人,他们仰望圣人,如大旱之盼云霓。君子以仁义道德为本,心系家国天下。在家则思君,其家庭作用飘忽;为师则学为政,其教师身份飘忽,孔子在鲁,则周游列国,荀子赵人,却西游于秦,祭酒于齐,为官兰陵,其政治生涯、学术生活也飘忽难定。盖因现实功利,君子不屑为;众人争夺冲突,君子不参与。面对功利,君子都不争,因为他们没有功利心,实在无所争;对争夺双方,君子不站队,无可无不可。

马克思唯物史观科学揭示了劳动群众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发展的真相和规律,儒家小人观则潜在暗示了小人的重要历史作用。在儒家看来,人若不能为圣贤、君子,其人生的意义和社会历史价值有限。但历史上,劳动者若能活着,自己能吃能喝,能睡能玩,健康长寿,就是幸福;要是还能结婚生子,传宗接代,绵延家族,繁衍人口,而且积极向上,学习进步,士农工商,从事生产,传承发展文化,则其生存意义和价值已超越个人范围,而遍及家庭、社会、国家、天下,延及家族、子孙、历史、文化,便活出了人生的普遍意义。小人个人力量弱小如草芥,但是若能加入集体,抓住社会生产发展主线,不断提高科学文化素养,又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也能汇众流入大海,形成社会历史洪流,势不可挡,彰显民心民意即天意的真理。

需要注意,小人的社会性和君子有主从、主辅之别。荀子说,人能群,但君子能学习,懂礼义,能认识把握礼法以“明分使群”,成就人的社群性能。君子似乎是社群的精英、领袖。君子和小人关系,便如舟与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从道德礼义上看,君子为主,小人为从。但孔子又言,“君子矜而

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为什么?因为“人之过也,各于其党”。(《里仁》)偏党“阿比”,^[34]“相助匿非”,^[35]自私自利是人们犯错不公的重要原因。君子是社会的主体力量。但猛兽不群,鸷鸟不双,正直的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君子之间互相难以成群。而小人却可以因势利导,随时随地结党成势,左右社会形势变化,甚至影响历史发展趋势。这是从社会现实力量看,小人总是主流,君子零零星星,被边缘化了。

在儒学思想不能全面普及实践的情况下,君子尊崇的道义力量不一定都能变成现实力量。民本思想未能落实为政治民主、历史主人翁思想,最重要原因,在于民众未必尽为君子,不是都有诚笃道德。在社会历史趋势中,社会生产力整体中,道德比重狭小,道德层次低下,则社会历史发展不能尽如人意可知。这实际上是社会生产力落后导致人性异化的表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人民群众对于这种缺乏道德水准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也必定不满,而期盼高道德水准的、真善美的文明发展方式。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越来越高的历史条件下,致力于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特别是提高广大劳动群众的道德水平,十分重要。

在儒家那里,小人的社会政治性主要表现在民本思想中。需要明确的是,民本,并不是以小人为本,绝对不是以自私自利为本,更不是以个人主义为本。民本思想中,民众既不是没有道德,而皆为小人;也不是完全认识和实现了道德,而为圣贤或君子。而是处于道德的有无之间,需要民众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才能认识和实现其内在道德本性。在国家层面讨论民众和道德的关系,是儒家德治思想的重要部分。《大学》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前两纲领涉及明德和民众的关系。《大学》将明德和民众理解为本人的本性和其社会表现的关系,要求人们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追求内圣而外王,实现内外、圣王统一的理想人生社会。认识处理民众和道德的关系,应将其置于天人合一、内外合一、圣王合一、主客合一的背景中,加以规定和调整。要求民众接受教育,学习进步,克己复礼,既要进行人性修养,也要进行文明教化,觉悟和实现人性或道德,使所有人都能超越小人而成就君子以至圣贤的理想人格。

儒学和马克思的学说也都为小人“脱小”提供了理论指导,指明了未来发展方向。在儒学看来,人之所以为小人,不学习上进,修养不够是根本原因。在马克思看来,人之所以为劳动者,受剥削,遭受社会不公待遇,归根结底是因为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生产关系没有理顺,存在劳动分工、财产私人占有、市场交易等,导致人性异化,人剥削人,人压迫人,劳动群众才越劳动越贫困,最终使人不成其为人。在儒学和马克思那里,小人的含义有别,致小的原因有异,则“脱小”之方也必不同,不能混淆。如果说儒学小人观提供了人们在道德上“脱小”升格为君子的理路,那么,马克思的劳动群众观则提供了人们在社会生产基础上“脱小”而升格为国家和历史主人,获得平等人格的历史道路。两相结合,可以为我们新时代的“脱小”实践提供丰足而渊深的理论源泉和指导。

儒学提供了人性修养和文明教化两条互相支持的道路,帮助我们不断提高道德修养,超越小人局限,上达君子甚至圣贤高度;它要求我们仁爱、教化小人,帮助他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儒家主张实行德治或仁政,强调小人对于家国天下的根本地位。儒家的小人观,要以道德内涵为基础,学习汲取马克思的劳动群众观,充实丰富其社会生产和政治内涵,明确劳动群众的生产、社会、国家、历史等各方面的主体地位,将提高劳动群众科学文化水平作为“脱小”的基本工作。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群众不能只以心胸格局的大小而论,也不能认为劳动群众只要天理良知而不要正常的功利欲望。必须将“小人”置于社会生产活动中,放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人性异化及其克服和人性自觉实现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衡量。马克思说:“但是这些群众的共产主义的工人,例如

在曼彻斯特和里昂的工场中做工的人,并不认为用‘纯粹的思维’,即单靠一些议论,就可以摆脱自己的主人和自己实际上所处的屈辱地位。他们非常痛苦地感觉到存在和思维、意识和生活之间的差别。他们知道,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远不是想像中的幻影,而是工人自我异化的十分实际、十分具体的产物,因此也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以便使人不仅能在思维中、意识中,而且也能在群众的存在中、生活中真正成其为人。”^[36]劳动群众也是人,要过人的生活,像人一样吃穿住行,在社会现实生产生活中实现自己作为人的价值,获得人的尊严。但这不能只在思想中设想,还必须落实为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社会生产关系的持续变革,特别要落实为劳动群众生产生活能力的提高。

马克思认为,劳动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翁,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也始终是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主体力量。现实劳动群众的生产生活,劳动群众作为人的发展,劳动群众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理想的条件等,是哲学、历史学的主要研究问题。马克思特别研究了劳动群众人性异化的社会历史原因,如劳动分工、劳动异化、财产私人占有、剥削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国家作为暴力机器的出现、剥削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等。他发现克服和消除劳动群众人性异化的办法,就是进行社会革命,推翻剥削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为根本改变劳动群众社会底层地位作历史准备。在此过程中,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基础上,我们还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改革社会制度,才能为劳动群众自由全面发展理想的实现准备更为充分的历史条件。可见,儒学为小人超越自身而升华为君子、圣贤等,提供了理论说明,马克思则为劳动群众成为历史的主体力量提供了科学说明。两相结合,则要求我们不仅要进行日常的人性修养和文明教化,提高小人的人性修养和文明水平,而且要在社会建设方面着力,为小人全面而根本上“脱小”提供深厚的社会实践基础和相应历史条件支撑。

小人“脱小”之路,是一条需要全人类参与的历史征程。如果说古代儒家给小人的出路是做君子,成圣贤,那么,庄子等道家开的方子却是放弃俗世,与天道为一,成为不食五谷的真人、神仙。《庄子·大宗师》:“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作为理想人格的君子,在天道面前也只是“小人”;老庄道家站在自然天道高度,提升了“君子”理想人格的自然理性色彩。侯外庐解释《庄子》此义说:“这是由于先王观念的解放,而把两周以来君子与小人的‘氏所以别贵贱’者,在思想形式上解放,然而同时则把君子与小人都还原为和天对立的人,更把人道还原于天道,否定了人类性,这又是把解放本身也否定了。西周以来的‘天人合一’论是氏族曾孙或嘉乐君子和天命的统一,现在,破除了这一可能‘陶铸尧舜’的统一,而复把人类却从地下送到天上,便是连人类的现实也否定了。孔墨对于先王或附保留,或附条件,把先王观念拉到地下,是学说的进步,老庄在思维形式上解放了‘先王’,是发展的要素,而在人类现实上解放了‘解放’本身,则是反动的。哲学家们言老庄思想革命者,实是蔽于形式,而不知内容,正同于庄子哲学本身之所谓‘蔽于天而不知人’。”^[37]庄子虽给小人开出药方,但没有什么家底,忙于谋食忧贫的农工商们是很难照方抓药的。

唯物史观看,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直在为小人“脱小”创造历史条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制度的改进,人们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都是“脱小”的历史准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又增添了社会政治制度的保障。但小人“脱小”,毕竟是个人的修养问题。没有个人修养努力支持,客观环境、条件再优厚全备,人们“脱小”也不可能成为现实。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社会经济发展进步,人们身上的“小”不会自动退隐,人格修养不会自发提升。“脱贫”难,“脱小”更难。现代化不仅需要物质、制度、思想文化现代化,尤其需要人的现代化,要求人具有君子人格,成为真正的文明人。心胸狭窄,格局浅

狭,形象猥琐,气质粗俗,这些“小人”性征严重制约了新时代人民群众劳动能力和快速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携手共进,同步提高。儒家提出的一系列修养、教化内容,都可以说在为小人“脱小”提供内在修养和文明水平的准备。孔子的学习和克己,《大学》的大人之学,《中庸》的中庸之道,孟子推崇大丈夫,提出养浩然之气的方法,荀子的劝学和礼法,张载的变化气质说,程朱的穷理居敬互相发说,王阳明的致良知说等,都在为小人大心升格为大人寻出路,找方法。《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特别为小人设立了超越个人束缚的修养框架和路径,促使修养者在家庭、国家、天下等社会共同体中生产生活,针对物、知、意、心、身、家、国、天下等天人心身社会多种要素同时用功修养。孟子的“大丈夫”提供了理想人格引领,荀子的“大理”提供了真理依据和规范保障,张载的“大其心”则提供了主体条件。所以,我们可以断定,儒家人性修养论、文明教化论等思想内容,在新时代对于帮助人民群众克服和消灭自己身上隐藏的“小”,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依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建设性意义。

注释:

[1]《论语·先进》:“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朱熹注:“野人,谓郊外之民。君子,谓贤士大夫也。”([宋]朱熹:《论语集注》卷六,《四书章句集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3页。以下只注篇名、卷数、《集注》本页码。)

[2][23][37]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八卷,长春:长春出版社,2015年,第282、16、160-161页。

[3][宋]朱熹:《子路》,《论语集注》卷七,第142页。按《孟子·滕文公上》:“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小人之事,指治于人(接受他人统治)、劳力、食人(养活他人)的人,在孟子相处的战国中期,这实即指农工商等体力劳动者。

[4][宋]朱熹:《阳货》,《论语集注》卷九,第182页。

[5][26][28][33][36]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08、681、262、104、66页。

[6]参见张茂泽:《论孔子的君子观及其历史发展》,《学术界》2016年第12期。

[7][12][宋]朱熹:《里仁》,《论语集注》卷三,第69、71-72页。

[8][9][30][宋]朱熹:《雍也》,《论语集注》卷三,第90、86、88页。

[10][18][宋]朱熹:《颜渊》,《论语集注》卷六,第132、138页。

[11][13][宋]朱熹:《子路》,《论语集注》卷七,第148、147页。

[14]“北大师生对辛德勇的评价”,http://www.360doc.com/content/23/1031/20/13924396_1102324993.shtml。

[15][20][21][24][31][34][宋]朱熹:《卫灵公》,《论语集注》卷八,第165-166、165、165、166、168、166页。

[16][宋]朱熹:《为政》,《论语集注》卷一,第57页。

[17][宋]朱熹:《宪问》,《论语集注》卷七,第155页。

[19][35][宋]朱熹:《述而》,《论语集注》卷四,第102、100页。

[22][宋]朱熹:《子罕》,《论语集注》卷五,第110页。

[25][宋]张载著,吕锡琛点校:《经学理窟·诗书》,《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56-257页。

[27]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第99页,也参见第24、120、29、28、159、13、16、18、108、189、191页。

[29]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史纲》(上),《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二十卷,长春:长春出版社,2015年,第39-40页。

[32][宋]朱熹:《八佾》,《论语集注》卷二,第67-68页。

[责任编辑:陶婷婷]